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

石泉文集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



石泉文集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泉文集/石泉著.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4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丛

ISBN 7-307-04878-7

I. 石… II. 石… III. ①石泉—文集 ②历史地理学—文集 ③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①K901.9-53 ②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885 号

责任编辑:陶洪蕴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80 1/16 印张: 54.125 字数: 830 千字 插页: 8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4878-7/K · 287 定价: 9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石 泉

1918年1月出生，安徽贵池人。
1944年燕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教授，获硕士学位。
1954年来武汉大学历史系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研究中国近代史，后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特别是荆楚历史地理研究，创办了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科。

主要著作有：

-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 《古云梦泽研究》（合著）
-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 《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
- 《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主编）





1



2



3

- 1 ▶ 1937年6~7月，参加何基沣将军主持的西苑北平学生集中军训期间的留影。
- 2 ▶ 1938年9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年二十岁。
- 3 ▶ 1942年9月自大后方到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复学。与挚友陶增荣摄于成都华西坝万德门。1944年，他在徐中舒先生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春秋吴师入郢地名新释》，这是他写作历史地理论文的开始。
- 4 ▶ 1947年至1948年间在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下写作硕士学位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时的留影。
- 5 ▶ 20世纪90年代石泉与侯仁之夫妇的合影。进入燕大不久，石泉即认识了侯仁之先生，是他最早把石泉带入了历史地理的科学之门，从此成为终身师友。

4



5





1



3



2

- 1 ▶ 1997年《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即将出版之时，摄于清华大学陈寅恪先生故居前。这是当年陈先生指导石泉写作硕士学位论文之所。
- 2 ▶ 1994年9月2日与夫人李涵教授摄于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寅恪先生故居楼下。
- 3 ▶ 1960年石泉夫妇摄于珞珈山。
- 4 ▶ “文革”后期野外考察途中小憩。
- 5 ▶ “文革”后，重返珞珈山讲坛。

4



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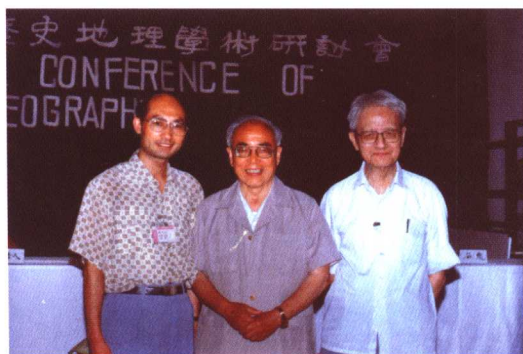
2



4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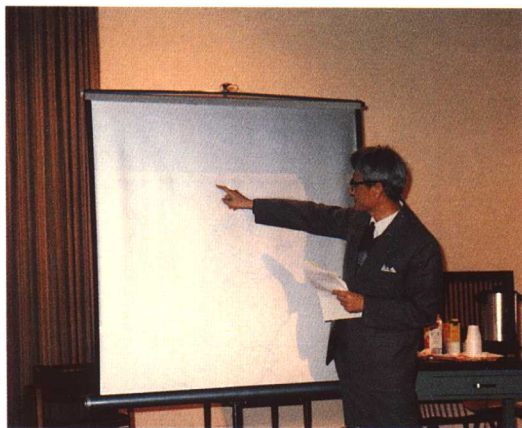
5

- 1 ▶ 1977年10月在珞珈山麓。
- 2 ▶ 1978年10月与挚友曾志开先生在长沙。
- 3 ▶ 1978年12月侯仁之先生来武汉大学讲学时与石泉一家的合影。
- 4 ▶ 在燕大读书时，石泉与时任燕大教授的著名友好进步人士赖朴吾（Ralph Lapwood）有过密切交往。这是1986年他与来华访问的赖朴吾教授夫妇的合影。
- 5 ▶ 1996年夏出席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中为侯仁之先生，左为石泉先生首届博士生徐少华）。

1



2



3



- 1 ▶ 1987年3~5月应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之邀，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先后在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西东、加州等大学讲学，并出席美国“亚洲学会”第39届年会。
这是访美期间与夫人李涵教授的留影。
- 2 ▶ 1987年访美期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有关楚国历史地理与文化的学术报告。
- 3 ▶ 1987年访美期间，石泉夫妇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夫妇的合影。
- 4 ▶ 1988年11月，由石泉发起并与美、日学者共同筹办的“楚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召开。照片为中外学者在宜城楚皇城遗址考察时所摄（左起：王光镐、平势隆郎、柯鹤立、石泉、蒲百瑞、安倍道子）。
- 5 ▶ 1988年11月，在“楚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右为陶德麟校长，左为朱雷教授）。



4



5

- 1 ▶ 1990年9月摄于江西兴国新城。1941~1942年抗日战争期间，石泉曾在流亡于此的江西豫章中学任教一年。
- 2 ▶ 1993年12月在母校北京市立四中的体育场大门前。
- 3 ▶ 1995年10月率政协湖北省委员会代表团访问香港、澳门。这是在香港的留影。
- 4 ▶ 1996年10月摄于北京恭王府。
- 5 ▶ 1997年7月11日与夫人李涵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纪念照。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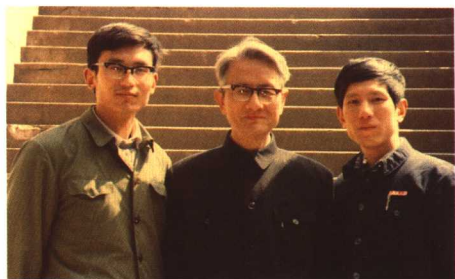
3



5



4



1



2

1 ▶ 1986年9月，在武汉大学建立历史地理学博士点，任博士生导师。这是石泉与首届博士生张国雄、荆楚史地与考古研究室教师刘涛的合影。

2 ▶ 1998年11月27日，在博士生杨果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介绍博士生的学习与论文写作情况。

3 ▶ 2003年初与博士生王红星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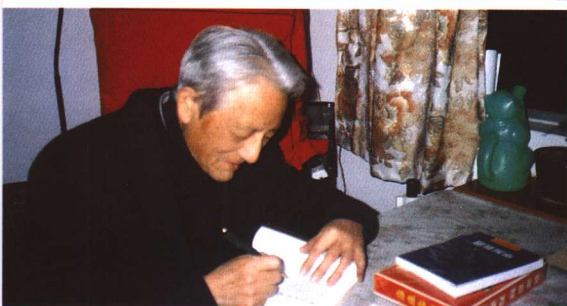
4 ▶ 2000年初在家中小书房伏案工作。

5 ▶ 2001年1月在海南岛。

6 ▶ 2003年春节与家人在一起。



3



4



5



6

30



自 序^①

一、我是怎样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

我出生在一个晚清以来的封建“世家”中，家里有不少藏书。父亲书架上堆满了线装史籍，他也常在饭桌上以及晚上休息时间对我们谈论史事，这引起了我对历史越来越大的兴趣。我的曾祖父刘瑞芬曾任清朝驻德、俄、奥、英、法、意、比的出使大臣，所以家里曾有一些 19 世纪的欧洲地图，和后来的欧洲各国疆域不大相同。这使我对历史地图，特别是疆域变迁图，很感兴趣。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我在北平读中学时，开始受到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的影响，对历史地理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禹贡》和顾先生主编的《古史辨》，以及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他一些有关古代地理的论著，均以其突破传统成说的洞察力，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见解，对我也起了有力的引导与启发作用。此后，每遇到一些被人们视为当然的说法，我总喜欢多问几个为什么，以期探明究竟，弄个水落石出。

① 这篇“自序”是编者撷取石泉先生《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 1997 年版）之“自序”、《我的治学道路与方法》（载《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武汉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1～84 页）以及在评审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时的自述材料等相关部分编缀而成的，除了语气转承与必要的字句调整之外，没有作较大改动，更未增加任何内容，并最后经李涵先生审订。所以，它应当比较切实地反映了先生自己的想法。——编者注

1938年夏，我高中毕业时，北平已是沦陷区，许多国立名牌大学都已南迁，我遂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在燕大，结识了侯仁之先生。他当时是研究生，专攻历史地理。他告诉我不少他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心得体会，引导我逐渐自觉地对这一学科进行初步探讨和系统求知。以后修读洪业（煨莲）先生“历史方法与实习”课，开始受到系统的史料学训练，初步体会到考证方法在历史科学中的去伪存真作用，和学风“谨严”意味着什么。

1941年2月，我们一些同学带着要求抗日、民主的共同愿望，离开北平，进入“大后方”。我在福建、江西短期工作了一年半，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是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动行径，对它大失所望。后又转到当时流亡于兴国乡间的“南昌豫章中学”任教，担任了全校从初一到高三的中外历史课，并有两学期兼教一些语文和地理课，首次在实践中用我所学，和各班同学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结下了终身难忘的情谊，也奠定了自己愿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兴趣。也在这时，我有机会阅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英文本），予我思想感情上很深的触动，大大地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钦敬与感激之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燕大被日军封闭。次年，燕大在成都复校，我也在9月份从江西回到成都母校继续学习。1943年秋冬间，徐中舒、陈寅恪教授等先后来燕大任教，我连续听这两位老师好几门课，感到耳目一新，进一步开拓了我的学术眼界与思路。特别是陈师的讲课，那种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谨严深厚的功底，尤其他那种善于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出人们意料不到而细想又理所当然的新问题、新见解，使我感到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学术享受！

二、师从陈寅恪先生学习中国近代史

1944年夏，我考入成都燕京大学研究院，在陈师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是年冬，陈师因目疾致盲，在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夜间尤需人照顾。作为入室弟子，我经常去值夜班。每当陈师中夜失眠，则陪侍闲叙，兴之所至，无所不谈。某夜，陈师问及



毕业论文拟作何题？我率尔答称：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近人王信忠先生已写成《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私意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何以中国与日本于19世纪60年代起步仿效西方，而二十余年后，以甲午战争为标志，竟乃成败判然，国际形势、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当时虽有此愿望，实未敢信其必能实现，因陈师当时之主要研究领域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不料陈师竟予首肯，认为此题可作，并告知：“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聆听之下，不禁喜出望外。此后即逐步搜集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直到1947年春，始正式撰写。历时年余，终于完成。

写作过程中，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想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大节或一小章（各章各节大小不等），则读与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则又尽量筛练，力求精练。其次则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彼此有出入者，必须认真加以鉴定，确定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则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作出解答，必至穷尽各种可能的歧见，皆予澄清之后，始同意此部分定稿。其高度谨严之科学精神，对我此后一生的治学态度、途径与方法，皆有深远影响。

此篇论文之目的，乃以观察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折点之故，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甲午以前政局概观》，追溯甲午战争爆发前30年的晚清政局，综论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满人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及三者错综复杂关系，指出此乃导致中国自强运动之失败、甲午战争必败的根源之所在。第二、三、四、五章则详述战争期间（1894～1895）清廷内部政局之变化。战争期间虽短，但因国内政治势力颇倚外患之日亟而

乘机加强活动，通过谋划战局以兼遂其打击对手（实力派之李鸿章与淮军将领及中枢之孙毓汶等）之政治目的，终于随败局演变之同时，亦逐步形成朝局之重大变化。故以四章篇幅，论述其迅速递嬗之迹，与夫转折之焦点所在。第六章《战后政局新形势》则从北洋局面、中枢政况及当时新兴势力之崛起三个方面综合论析甲午战争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与辛亥革命相呼应。

此篇学位论文颇历沧桑。当年清缮方毕，未及最后校阅，即逢国民党政府之“8·19”点名拘捕，仓促脱身离校，进入华北解放区。清缮本虽得师友帮助，代为上交学校，但解放后经院系调整，久已不知下落。而本人身边之底稿，亦在“文革”中荡然无存！原以为从此消失于世，空存追忆而已；岂料1991年获悉，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接收燕大图书馆的资料中，竟存有此篇在，遂于1993年前往复印全文。失而复得，快何如之！不仅重获40余年前的研究成果，尤要者，此乃陈师昔年精心指导，使我深受教益的物证，更是陈师指导的惟一的一篇中国近代史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弥足珍贵的纪念品。

陈师晚岁以口述方式，请黄萱先生代笔，写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记叙家世及父祖三代所经历之晚清政局，惜于“文革”浩劫中又复散佚，仅存残篇，经由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整理后，作为“附录”，收入《寒柳堂集》中（见《陈寅恪文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182页）。陈师于“弁言”中谈到写作此篇之心情与态度云：

今既届暮齿，若不于此时成之，则恐无及。因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证诸史料，参以平生耳目见闻，以阐明之……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知我罪我，任之而已。（见《寒柳堂集》，第165~166页）

又云：

清代季年，士大夫实有清流浊流之分。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因草此文，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他日读者倘能详考而审查之，当信鄙言之非谬



也。(见《寒柳堂集》，第166页)

又于“弁言”之末句云：

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乎？

据此，则可知陈师此时已改变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决心在晚年亲自着手阐明所知晚清史事真相，自信已能“排除恩怨毁誉”，作出经得起审查的公正论述，以存信史而待后之识者。此亦足显示师门三代人爱国之家风，与史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

追忆当年陈师指导写作本文时，亦持此种态度。在严师教诲下，自己一方面必须以认真审订的史实作为立论基础，不敢凭空臆测；另一方面则排除个人好恶等感情因素之干扰，力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公正客观之论述；由此确信：只有保持历史本来面目，认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始能对后人具有真正之借鉴意义。

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在史学领域中颇受重视，成果迭出，远逾过去。而关于甲午战争前后之清廷内政背景方面，作过较全面系统研究，并提出相应看法者，则尚未多见。因此，藉内子李涵（缪希相）教授之督促鼓励，及诸至亲好友之帮助，将此半个多世纪以前之旧作，交由三联书店于1997年出版。现又收入本文集之中。窃以若能借此文抛砖引玉，有助于此课题之进一步探讨，则所深幸！至于文中之观点与见解，由于当时学术环境与自身思想认识之局限，衡以现今标准，必有疏失之处，幸祈读者不吝指教。私忖此文恐只能作为20世纪4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前之产品看待，自不能与当前科研成果已达到之水平相提并论也。本人久已转事荆楚历史地理之研究，今年事已高，更无余力再就本课题作进一步探讨，如能以此作为后人研究本课题之一块踏脚石，于愿足矣。

三、我是怎样选择荆楚历史地理研究的

我最初踏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是在60多年前。1943年

春，我在燕大修读郑德坤先生指导的“高级史学方法”实习课。我选了一个从中学时就已有兴趣的实习课题，即：春秋吴国都城及中心地区究竟是在江南的今无锡、苏州市一带，抑应在淮南的清江、淮安一带？根据已掌握的论据，我倾向于后者。通过实习课，对此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之后，信心更增。1944年春，我在徐中舒先生指导下开始写作本科毕业论文。最初原想以考订春秋时的吴国疆域所至与都城所在为主要内容。徐先生认为这一课题的材料不够，初学如我，恐不易作。于是我就缩小范围，只就《左传》、《国语》、《史记》等所记吴楚交兵涉及的一系列地名，逐一进行考释、定位，希望由此对春秋中晚期吴楚边界所在及其变迁，理出一个头绪来，写一篇《春秋吴楚战地考实》，借以对吴国西部边境所至，有所澄清。

但是，当进行到考订春秋晚期吴、唐、蔡师入郢之役的有关地名位置时，我对于流行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疑问，感到那种说法在情理和史料上都是矛盾百出，很难讲得通。于是我对《左传》所记这次大战役过程中涉及的二十几个地名的位置，进行了一番返本探源的重新考订，跳出隋唐以来直至近世逐步形成的旧传统框框，主要依靠更早的先秦、两汉、六朝（直到齐梁时）的古注和经过认真鉴定的有关史料，与《左传》所记互相印证，结果得出了与流行说法全然不同的、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却又不得不然的新解。原来：吴师是乘舟溯淮西上，登陆于蔡境，会蔡师西进。逾楚方城隘口（即“城口三隘”——大隧、直辕、冥阨，它们并不像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武胜关一带），入南阳盆地，到唐国（经过认真考订，当在今河南唐河县南，而非在今湖北随州市西北之唐县镇），会唐师，连兵南进，“自豫章与楚夹汉”（此处之“豫章”，当是《水经注·洧水篇》所记，位于今鄂豫边界、唐河与白河会流前、两河之间的“豫章大陂”，正在唐国西南不远处，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安徽寿县附近或湖北安陆市南；吴楚两军“夹汉”对峙处，当在今襄樊市附近的汉水两岸，而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武汉市及附近之汉水入江处）。而吴楚之战的几个重要战场，实皆在今襄樊市东北的汉水左岸。另一方面，楚昭王君臣于郢都陷落前，仓皇出奔，“涉睢（沮）济江”，所经之地，如成臼及楚郢公邑，都在汉晋时的古竟陵县地，即今湖北钟祥县境的汉水以东。而“奔郢”之前所经“云中”遇盗之处，又必然去郢公



邑不远；云中又是楚王自郢出奔，“涉沮（睢）济江”之后，即进入的地方，则所济之“江”，应即成臼附近之汉水，而绝非今长江，所涉之“睢”水，亦当近汉，从而只能是今宜城平原上的蛮河下游，而绝非如流行说法所云，为今江陵附近之沮漳河。因此，作为吴师入郢与楚昭王奔随的接合点——楚郢都就只能在今湖北宜城县南境、汉水以西、蛮河（古睢水）下游北岸的宜城平原上，而不可能远在长江边今江陵县北的纪南城遗址。

根据以上的论点与论据，我于1944年写成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题为：《春秋吴师入郢地名新释》。今天看来，这还只是较粗糙的习作，不深不透之处还很多，对流行说法的剖析尤其不够，但轮廓已具。对我来说，是着手研究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开端，也是对流行的传统说法最早打开的重要突破口。我感到：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究在今何处，是研究古代荆楚地理一个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1944~1954年这10年间，我由于各种原因（客观环境和内外形势的制约，加上自己当时学术方向还未定），主要的时间精力未能用于历史地理方面，但兴趣则始终保持着。每有机会，总要在搜集材料和思考有关问题方面，有所积累。在随侍陈师期间，也有不少次把自己对荆楚历史地理的想法向陈先生求教过，本科毕业论文早先也请陈先生看过。陈先生鼓励我继续搞下去，并蒙指点：注意六朝时期江陵外围城邑如江津、马头、豫章口、灵溪、柞溪……的地望；也要注意古今里的比率大小与换算问题。这些，都给我以很大启发，我在后来的研究中，也都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1954年春，我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从1955年起，在教学之余，又重新捡起了荆楚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这次把中心课题转到着重研究楚郢都及秦汉至齐梁时的江陵城地望问题，把前此关于吴师入郢的研究成果，作为这次提出问题的引论，进而探究与古郢都、江陵密切相关的齐梁以前古沮、漳二水源流所至，再结合地形图，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古沮、漳即是今蛮河流域的证据。由此更进而证实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先秦至齐梁江陵城的位置必不出今汉水中游西岸、宜城县南境的宜城平原上。然后通过具体探讨古郢都、江陵本身的地理情况与周围的某些相关地名所在，进一步认知：汉代及三国前期的江陵城就在楚郢都故址。公元248年，吴荆州守将朱然重修江陵